

中国观

2015年第10期 总第45期

CHINA WATCH

国际视角 前沿观点 World Insight



复旦发展研究院
FUDAN DEVELOPMENT INSTITUTE



上海市高校智库研究和管理中心
Centre for Think-tanks Research and Management in Shanghai

内部资料
仅供参考

目 录 | CONTENTS

- 01 人民币走向世界之路 /Paola Subacchi
- 03 中国需要额外的货币宽松政策吗?——宽松货币政策可能是在制造困境而非解决问题
/Alicia García-Herrero
- 08 应对中美核合作危机 /Mark Hibbs
- 10 避免中美南海裂痕的加深 /Michael Swaine
- 14 另眼看中国: 来自非洲、拉美以及欧洲的观点
/Amadou Sy, Harold Trinkunas, Philippe Le Corre
and Yun Sun
- 17 中美能创造一种惠及所有人的新商业文明吗?
/Patrick Mendis
- 25 中国的国际增长议程 /Michael Spence
- 27 马克斯·费舍尔将“很难得到帮助”的故事运用于
中国 /Center for Economic and Policy Research
- 29 城市化是印度落后于中国的原因 /Yukon Huang
- 31 中国的幸福与健康: 发展的悖论 /Carol Graham,
Shaojie Zhou and Junyi Zhang
- 33 中国对环境健康危机的应对 /Yanzhong Huang
- 37 网络生活——智能手机, 社交网络和多任务进行
/Thomas Herdin & Robert M. Bichler

编辑部

Editorial Department

责任编辑	Responsible Editor
张 怡	Zhang Yi
沈国麟	Shen Guolin
黄 昊	Huang Hao
执行编辑	Executive Editor
夏 梦	Xia Meng
栏目编辑	Column Editor
付 宇	Fu Yu
朱红蕊	Zhu Hongrui
胡唯哲	Hu Weizhe
沈 郊	Shen Jiao
张 圆	Zhang Yuan
刊物设计	Art Editor
范佳秋	Fan Jiaqiu

中国观
CHINA WATCH

主办 | 复旦发展研究院 FDDI
上海市高校智库研究和管理中心
CENTREMS

地址 | 复旦大学光华楼东主楼 7 楼
中国上海市邯郸路 220 号
The 7th Floor, East Main Building,
Guanghua Towers, Fudan University,
220, Handan Road, Shanghai, China

邮箱 | thinktank@fudan.edu.cn

电话 | 021-65645596
021-55665501

鸣谢 | 上海钰翔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人民币走向世界之路

Paola Subacchi

人民币是否会加入决定 IMF 特别提款权 (SDR) 价值的一揽子货币呢? 决定权主要集中在 IMF 最有发言权的 G7 国家中。如果他们认为是利好的话, 就会同意。

这是一个具有政治引申义的技术决策。它将会加速中国人民币成为像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一样的国际储备货币的进程。正如三月 Christine Lagarde 所说, 人民币加入 SDR 的一揽子货币只是时间问题, 今年或者 2020 年 (2020 年 IMF 重新考虑规划 SDR 的一揽子货币的组成)。

在这个方面, 我们没有理由一直等待。今年将人民币纳入一揽子货币, 或者最晚 2016 年, 是在发出一个各国均会受益的积极信号, 即中国是一个受欢迎的, 值得信赖的 IMF 成员。

反驳意见: 4 万亿的原因——中国的货币还没有准备好迎接它的黄金期

本月上旬, G7 国财务部长会议指出, 无论人民币的加入将带来多么理想的政治影响, 对人民币的技术评估才是决定最终结果的关键因素。但是如果评估仅仅是基于技术指标, 比如“自由使用”(IMF 的专业术语: 货币应该具有在全球范围内自由兑换和使用的功能), 人民币应该加入。与美元不同, 人民币还不是完全可兑换货币 (在中国银行兑换外币的数量受限), 而这为国际使用带来不便。

一个更加有效的方法可能是评估其国际货币体系中扮演更重要角色的潜力, 引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表述, 即兼顾近期成就和未来的发展。自 2010 年 IMF 进行最后一次特别提款权讨论以来, 中国采取在香港、伦敦和新加坡建立人民币清算银行等措施, 加快了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现在超过 20% 的中国贸易使用人民币结算, 而 5 年前这个数字还是 0。此外, 现在人民币现在已经成为继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之后的第五大国际结算货币。各国央行和官方机构持有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的数量也有所增加, 据投资银行估计, 官方国际货币储备中有 0.5%-1% 是人民币。2010 年和 2014 年之间发行的非中国人民币计价的债券也增加了约 1200 亿, 尽管仍然落后于境外发行的其他主要货币。

根据中国中央银行行长周小川 4 月访问华盛顿期间的声明, 推

导读 >>

作者认为人民币能否加入 SDR, 决定权在 G7 国手中, 应综合考虑政治、经济方面的因素。尽管人民币还不满足自由兑换的要求, 但是作者举例说明了人民币在金融开放、金融改革和浮动汇率制度等方面的进步, 并且认为现在的关键是世界各国是否已经准备好信任中国, 鼓励中国继续扮演世界良好成员的角色。

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更多措施已在酝酿之中。此时，人民币汇率浮动空间扩大的目标已经达成，随着中国政府调整经济，重点关注内需，其他目标也会慢慢达成。逐渐地，人民币汇率制度会由固定汇率变为市场决定的浮动汇率制度。

5月，IMF声明，人民币不再是被低估的，确认了中国货币政策对汇率的控制减弱。与之相反，IMF 2010年评估人民币时，坚定地认为人民币是被低估的，而美国国会则最担忧中国的货币控制政策。

如果IMF考虑这些更加广义的进步指标，是否将人民币排除在SDR一揽子货币之外并不明确。唯一具有争议的方面仍是资本项目可兑换。在这个方面，中国当局坚持认为应该推动资本流动，但是应该同时进行严格监督，以防投机等行为。这是“中国特色的资本项目自由化”（周小川提出），即有管理的兑换。如果IMF执行委员会认为有管理的兑换，仍然是限制货币的自由使用，那么这将成为人民币加入一揽子货币的绊脚石。

然而，即使兑换问题表面上持续拖延了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最终结果可能会取决于政治。中国政府希望人民币能够成功加入SDR一揽子货币，这将为人民币带来一系列国际认可。而这里的利害得失是在国际金融系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人民币的国际认可可是中国经济和政治路线的关键步骤，也是对中国在国际多边货币和金融体系中扮演积极角色的努力的认可。如诺奖经济学家 Robert Mundell 所说，“强大的国家拥有强大的货币”。如果人民币没有国际货币地位，中国的崛起仍是不全面的。

幸运的是，对于中国和其支持者而言，IMF的历史上也出现过类似的例外。举例来说，1981年将日元纳入SDR一揽子货币中时，日元本身也是可以自由使用，但是不是自由兑换货币。如是，将人民币也纳入SDR一揽子货币对政治和经济都有利。检验中国在金融开放、金融改革和市场决定的浮动汇率制度等方面的努力的最佳方式是支持中国将人民币转化为“成熟”的货币。

现在的/key问题不是苛求证据来表明中国完全接受与储备货币地位相伴而来的义务。关键是世界各国是否已经准备好信任中国，鼓励中国继续努力，成为世界大家族的优秀一员。

foreignpolicy.com

译者 / 杨会强

中国需要额外的货币宽松政策吗？ ——宽松货币政策可能是在制造困境而非解决问题

Alicia García-Herrero

和亚洲地区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一样，近几个月中国人民银行一直处在一个货币宽松的模式之下，未来似乎还有更多的宽松政策蓄势待发。关于中国人民银行需要采用什么样的货币政策的争论，一度立场两极分化的双方逐渐倒向额外的量化宽松政策。一些分析师甚至提出应实行全面的量化宽松政策（QE），以出售国债形式为地方资产融资，比如地方政府债券和其他存在违约风险的资产。毋庸置疑，中国央行可能进一步刺激已被高度干预的经济，而刺激政策将帮助债务缠身的地方政府清理资产负债表，并在同一时间，允许银行进一步放贷。假如这些政策仍无法拉动经济，任何额外的刺激政策，比如放开资本管制，也会促使人民币贬值，拉动外需。

考虑到当前不断加强的经济下行压力以及日益严峻的通货紧缩压力，以上措施对中国来说就好像动听的音乐，刺激经济复苏。而这音乐所带来的刺激力度的直接证据就是最近中国内陆和香港股市的戏剧性复苏。一些乐观的评论家甚至根据股市复苏，预测不久的将来将出现强劲的经济复苏，尽管大量经济指标数据表现惨淡。评论家观点正确与否，至少在短期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人民银行的政策，尤其是如果央行一路实行类量化宽松政策的话。

讽刺的是，不堪重负的央行宽松政策带来的流动性盛宴只会损害中国经济。关键问题是宽松政策通过人为降低融资成本，加大经济杠杆，这一在任何时代都表现糟糕的措施，换句话说，是新一轮的改革推动力。美联储最近历史上的阴影，即大繁荣演变为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为中国央行当前的政策讨论提供了预警信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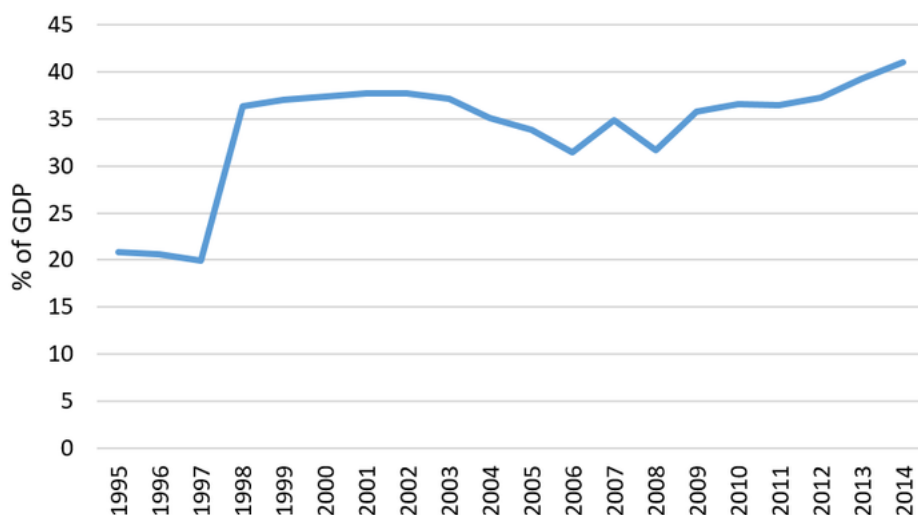
在以前的金融危机期间，中国都推动了改革。最近的是2000年金融危机，当时银行系统坏账严重。但是，当时有一系列的关键因素帮助中国当局控制局势，却没有产生不良后果。首先，中国的债务处于低水平（图1）。其次，潜在的增长率高，因为中国正在处于发展和城市化的早期阶段。第三，经济体更小也更封闭，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仍然非常有限。

中国今天的经济状况，更令人担忧，也更难以应对。首先，中国的整体债务水平已经超过了2007年的三倍，同时，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图2）与他新兴市场相比，也是非常大的。其次，全

导读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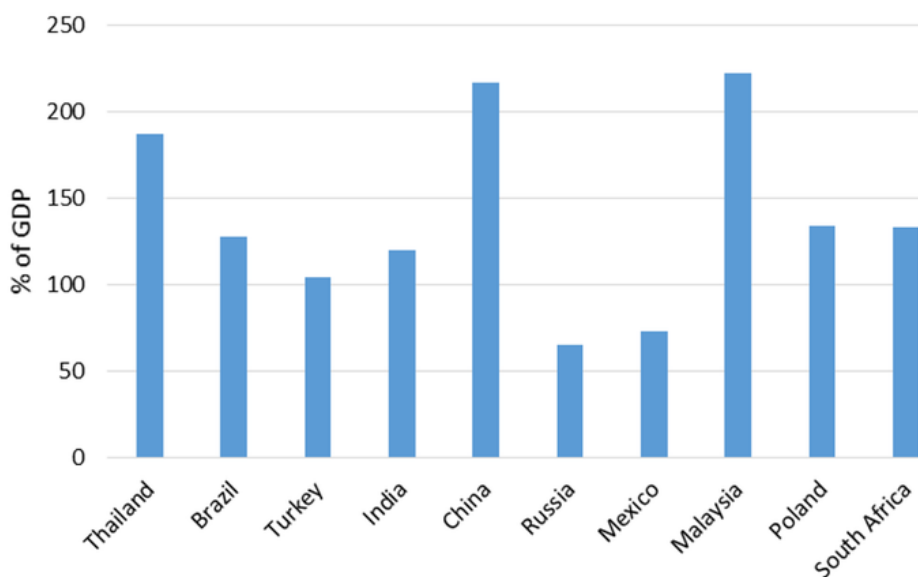
和亚洲地区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一样，近几个月中国人民银行一直处在货币宽松的模式之下，未来似乎还有更多的宽松政策蓄势待发。任何额外的宽松政策都将推动人民币进一步贬值，从而带来外部需求的增加。但中国的总体债务已经超过2007年的三倍。债务不断累积的过程中，不仅有存量问题，还存在流量问题。中国经济一直被相对较低的融资成本“宠坏”了。货币政策在降低融资成本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毫无疑问，中国人民银行手头有足够的政策工具来降低融资成本，但问题是我们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图 1 – 中国政府债务总量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世界经济展望 2015 年 4 月

图 2 – 公共债务和私人债务（跨国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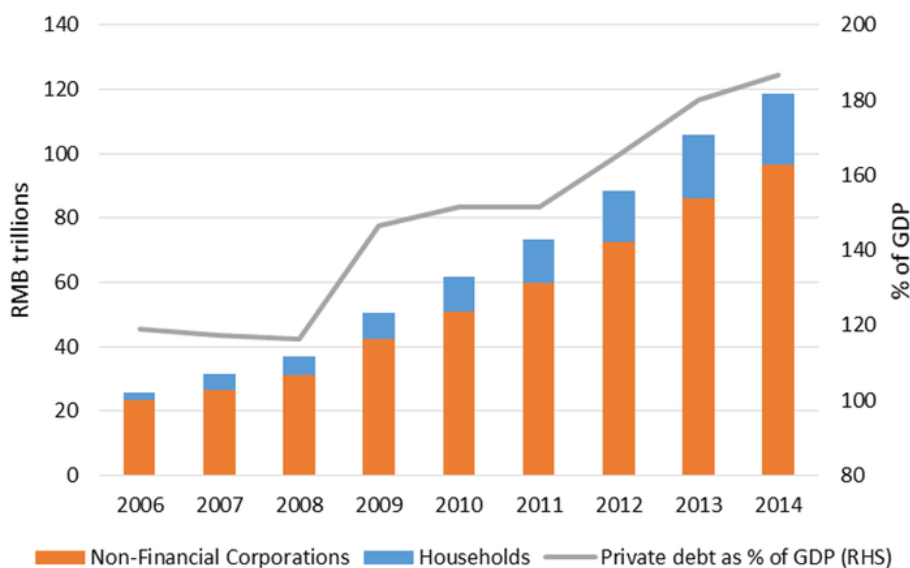


注释：包括家庭债务，非金融机构债务和政府债务。发达国家和中国的 2014 年第二季度数据。其他发展中国家 2013 年数据。数据来源：麦肯锡全球研究所

球 金融危机和相关的经济刺激计划只是债务迅速积累的原因之一。换句话说，随着债务堆积，这已不仅是存量的问题，同时也是流量的问题。在 2008-2009 年刺激计划后，公共债务开始大量增加，地方政府积累巨额赤字，这将使中国的统一财政账户（如果官方确实存在的话）类似于需要扶持的南欧一样，账面非常糟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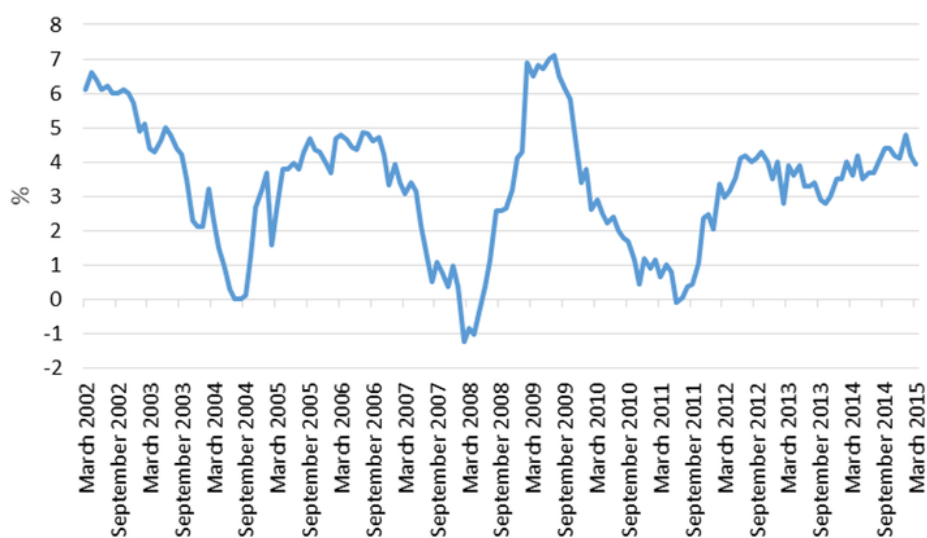
第三，由公司运营的私人部门，债务积累的速度更快。事实上，私人债务是 2007 年的六倍，已达到 2014 年国内生产总值的 150%（图 3）。更令人担忧的是，因为几乎没有在海外曝光，其实中国的企业和银行在货币廉价并且利率很低时借入了大量美元，根据我的估计累计高达 GDP 的 20%。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中国的名义增长几乎已经从高峰水平减半。因此，在债务的名义增长高企时美妙的消失效应不再有效。

图 3 – 中国私人债务



数据来源：国际清算银行和中国国家统计局

图 4 – 中国实际利率



注释：计算公式是一年期贷款利率减去 CPI。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国家统计局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的保护伞（无论是在可以私有化的公共资产方面，还是国际储备方面）从速度和程度上来看，已经开始损害中国经济了。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最近突然上涨的资本实际利率，而在同一时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开始下降。事实上，最安全的资产——政府债券的实际利率在 2% 徘徊（2011 年的负利率）。虽然这听起来还是相当低，但我们不能忘记，中国经济一直被相对较低的融资成本宠坏了，这是中国经济的增长过度依赖投资的原因。此外，地方政府和企业面临着比中央政府高得多的融资成本。实际上，融资成本的下限，贷款基准利率，实际已经高达 4%（图 4）。此外，许多地方政府和企业，特别是房地产开发商，需要在影子银行部门借款，其融资成本更高。

我认为相对于经济发展速度下行，融资成本高才是推动中国新一轮宽松货币政策的真正原因。问题是，融资的成本不仅取决于货币政策立场，也受到高杠杆经济信用风险的影响。这种较高的信用风险，至少在结构上，不能被宽松货币政策抵消。这需要中央政府承诺地方政府和公司（如果可能的话）不会破产，至少那些大到具备系统性影响的公司不会破产。虽然中国政府已经在玩捉迷藏，以寻求应急政策。但显然，急于寻求应急对策的态度违背其有利于市场发展的改革安排。此外，中国的财政不再像以前那样充足，这使开放式的救市政策可信度下降，也并非明智之举。

再看货币政策在降低融资成本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显然中国央行有足够的政策工具使其下降；问题是以什么样的代价。

再看货币政策在降低融资成本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显然中国央行有足够的政策工具使其下降；问题是以什么样的代价。鉴于中国大量恶化的财政和公司杠杆，央行的宽松政策无异于在改革的关键时期火上浇油。无论是从前苏联集团的经验看，还是从中国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阶段改革的经验来看，硬预算约束在改革过程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鉴于中国市场一直在增长，因此，部分中国企业已经跻身世界最大企业的行列。硬预算约束不仅是财政政策，它也保证了市场为企业信用风险定价，避免过多干预。换句话说，虽然中国央行应该支持中国经济，避免硬着陆，但是也应该正确地评价信用风险，停止一味人为降低短期融资成本的行为。更具体地说，央行应放宽货币政策来保证即使不完善的机构在不改变行为方式的情况下仍可继续运转，尤其是涉及杠杆的时候。这是中国央行需要学会设定的非常合适的安全线。此外，我们也不能忘记，货币政策立场也需要考虑财政政策。现在的财政政策已极为宽松，会向上拉动自然利率。巨额地方政府赤字不利于改革财政管理的硬预算约束。

因此，不管宽松货币政策听起来多么诱人，仍应该避免它刺激

地方政府和企业为逃避改革和调整而使用高杠杆。流动性过剩会导致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手头富裕，从而有能力抵消市场力量。如果这种担忧是真的，那些疑点重重的项目更是如此，中国潜在的量化宽松将会拒绝支持这些项目。总而言之，中国央行政策过分宽松只能加剧金融脆弱，更不用说全面的量化宽松。如果再次实行了宽松货币政策，金融稳定将成为关键问题，应对金融脆弱性成为第一要务，中国急需的改革将要再次推迟。

www.bruegel.org

译者 / 杨会强

应对中美核合作危机

Mark Hibbs

近日，奥巴马签署了与中国进行核合作的双边协议，此协议将替代今年12月份到期的1985年协议。新协议同一时间被送至美国国会进行审议，中美关系的未来方向变得不确定。

中国政府面对太平洋邻国的自信直接导致了中美双方的紧张局势升级。在此过程中，核能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去年五月美国司法部指控中国军人侵入西屋电气公司计算机，偷窃其在中国的核业务数据。

相比于30年前与美国签署第一个核合作协议时，现在的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不可忽视的大国。新协议为了更好的维护美国国防利益，必须反映这一现实情况。

未来几周内，立法者有可能会表达与中国继续核能贸易的两大忧虑：一是中国开发协议中可使用的钚，并利用到未来的核武器中；二是新协议不能保护美国公司的专利权。

下面我们来具体分析下这两个方面。

美国核物质和中国的核武器

新协议中有一个重要变化，即中国将提前批准同意重新处理由西屋公司在中国用于建核反应堆的核燃料，后续再将分离出的钚运用到民用核业务。放松核材料的管制是否意味着中国可能利用此制造核武器呢？

答案是否定的。自1964年，即中国军事反应堆和核处理工厂发明了军事级的钚和铀之后，中国就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中国违反与美国的双方协议，转移美国承付的民用核物质，转而用于生产核武器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如果在新协议中，中国选择重新处理美国承付的核燃料，那么重新处理过程一定要符合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保障要求。中国也会保证美国承付的核燃料仅保留在中国民用核燃料系统中，不会转移用于核武器。保证内容应该包括为美国跟踪核物质去向提供技术支持，允许美国员工参观核燃料安放地的装置，以保证它们是受物理保护的。美国承付的核材料只可用于指定的，受到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中国反应堆中。

中美双方将谈判达成行政安排来追踪在美国承付的核燃料。美国的追踪为保证核燃料的安全，以及核燃料的和平使用提供

导读 >>

近日奥巴马签署了与中国进行核合作的双边协议，并送至美国国会进行审议。作者分析了美国立法机构可能产生担忧的两个方面：美国核物质是否会成为中国核武器，以及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最后，作者得出结论，认为新协议内容方面的规定都巧妙地解决了这些潜在的问题，因而可以打消顾虑。

了更全面的保障。美国对核燃料的追踪应用于大多数合作国家，比如欧盟、韩国和俄罗斯，但是这种追踪未包括在 1985 年的中美协定里。

中国有一个再加工民用核电燃料的小工厂。它不包含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保障体系以内。中国未来是否想要在那里对美国承付的核燃料再处理，或者在法国的支持下，建设一个更大的工厂，如果是这样，则一定要保证新建设施符合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保障的要求。

总而言之，新协议不会疏忽使中国可以利用美国承付的核燃料增加对美国的核威胁。

保护知识产权

新协定没有解决黑客攻击美国公司的问题，毋庸置疑，单靠协议也无法阻止此类威胁。网络犯罪应由中美双方各自解决。但是新核合作协定可以打消美国提供给中国的，应用于和平核项目的技术被用于军事目的的顾虑。

美国对外核项目的技术转移一般不包括在双边合作协议中，而是由联邦法规的 810 条来规范。这些都需要一个审批过程，包括预期的中国方面的审批。由于美国对保护知识产权和未授权的再转让的担忧，美国对中国的技术转让需要符合新合作协议的规定。这意味着，一旦转让技术被滥用，中国就明确违反了双方协定。该协议会激励中国遵守相关规定，因为它预先授权的中国特定企业是公开透明的。该协议还将为美国和中国企业进行培训，以保护知识产权。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美国面临越来越多的核合作协议谈判的挑战，因为核贸易的条件是从美国向其他国家转移。美国的核能利用的下降反映了美国的核工业和技术权利的持续萎缩。这种趋势仍将继续，所以美国应当比以往更审慎地权衡核合作的风险和收益。

对中国而言，收益包括与美国这样一个全球核安排和核规范相对较新的国家共同建立了核贸易的法律框架，而且中国未来在核能行业的地位十分重要，会成为美国核工业最重要的国外市场。风险则包括美国将核物资转移到中国这样一个潜在对手手中，并且其透明度低于美国大多数的核贸易伙伴。但是新协议包含了预防这些风险的具体规定。

carnegieendowment.org

译者 / 杨会强

避免中美南海裂痕的加深

Michael Swaine

在最近公布的中国国防白皮书中，中国承诺将加强其日益增长的海军力量。与此同时，中美两国的官员就南海发生的事件爆发了激烈的争吵。这些都加深了中美间的紧张态势，并引发了全世界媒体与权威人士的热议讨论。

作为对中国在南沙群岛持续填海的回应，美国政府与军方的高级官员誓言要在必要时为了捍卫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利益而战。同时他们称中国对南海的声索是“荒谬的”，中国在那里的造地活动也被形容为要“军事化”该地区，是在筑造一条“沙的长城”。作为回应，中国官员和发言人警告美国不要进行挑衅活动，坚称中国不会让步，并重申了中国在“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上的决心。

与此同时，双方评论员误导性的言论、指责，以及要求采取更具进攻性行动的呼声，助长了这种激烈的言辞。许多美国人相信，中国正在采取一种协同的战略，以获取整个南海的控制权，包括陆地和水域。这也是中国一个更大企图的一部分，就是要把美国赶出亚洲，由它取而代之成为该地区的统治力量。他们坚持认为，只有采取一种更具进攻性、更持久的军事阻遏，以威慑中国、挫其锐气，方能避免上述结果的出现。

相比之下，许多中国人认为，美国正在利用南海和其他地区的主权争端，为其遏制、破坏中国在亚太地区影响力的行动正名，鼓励了其他国家挑衅中国，并将该议题军事化了。他们要求，中国必须加倍努力以强化自身地位，并向美国和其他国家表明，中国是不会被吓倒的。

中美关系常有波动，但当前情况并不仅仅是一个暂时性的下挫。它可能永久性地把中美关系推向一个更加敌对的、零和的方向，并使该地区发生动荡。让亚太地区某些角落里的岛礁争端，破坏一组对地区以及全球的和平繁荣都至关重要的双边关系，这是很愚蠢的。夸大的声明、模糊的威胁，以及要求更多军事行动的呼吁对实现目标没有任何帮助，只会使双方立场更加强硬，并强化两者之间的对抗。中美双方现在都需要更清楚地阐明他们的主张和不满，并在此基础上清晰地界定什么行为是不可接受的。同时，近期内双方要承诺提供相互担保，以避免某些突发事件，并努力稳定长期的情况。

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发出的信息被断章取义得十分严重，使得它看上去像是反对中国在该地区任何增加存在或是行动能力的活动，

导读 >>

中美在南海问题上的冲突和对抗近来愈演愈烈。两国内部都存在着一些声音，认为对方是在侵占本国利益并试图削弱本国影响。作者认为，中美两国应就己方的主张进行对话和谈判，明确什么行为是不可接受的，求同存异，并在此基础上减少军事对抗和零和博弈的思维。

却从不提及其他声索国的挑衅行为。在南海问题上，美国真正的利益只有两个，它必须聚焦在这两点上，并尽可能多地把它的言语和行动与这两点联系起来，以澄清自身的立场。

第一个利益是航行自由，它意味着除了依法建立的领海，美国海军可以进入任何区域，包括 200 海里的所谓“专属经济区”。中国没有兴趣阻碍南海的商业航运，警告他们不要做一些他们没有做过，将来也不会做的事情（除了战时可能会做），是不必要的挑衅和误导。

第二个利益涉及到中国有可能对其他声索国无端使用武力。这样的行为不可避免地会使该地区陷入更紧张的局势，并使中国更加强调整军事竞争而非和平的经济增长。中美双方在防止岛礁争端升级的问题上都有着重大利益。对于来自中国或南海其他各方的不明确的“胁迫”，美国需要放弃它模糊的立场，并专注于防止武力的持续使用。

美国的这两个利益都涉及对国际法及其程序的潜在侵犯或争端，这其中包括了三个具体的问题：1. 人造岛屿能否被用来划定 12 海里的领海以及专属经济区，并进而被用来限制海军的进入；2. 拥有专属经济区的沿海国是否能要求外国军队在经过专属经济区或从事情报活动前通知该国；3. 对于争议领土威胁、诉诸武力。

关于第一点，美国必须非常清楚地向中国表明，任何为人造岛屿声索领海或专属经济区的企图都是对国际法的侵犯，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事实上，美国偶尔表达过这一点，但更多时候，它的声明给人的印象是它反对中国填海行动本身。填海本身是没有意义的。事实上，每一个声索国都填过海，说中国做得比别人更多毫无意义。在缺少一个各方都同意的稳定进程的情况下，美国不管怎样都是无法说服中国停止其行动的。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中国要用这些填海土地做什么。

此外，中国对于人造岛屿附近水域的声索不够清晰。而中国越来越不愿意清楚界定其对 12 海里或是专属经济区外、九段线（旨在表明中国对整个南海拥有主权）内水域的声索，这放大了不清晰性。中国偶尔表现得好像对这些水域拥有排他性权利，但从未清楚地阐述其立场，因此极大地增加了不确定性。美国和其他各方已经反复要求中国澄清它对九段线的立场。

关于第二点，中国和美国对美军在领海外水域活动该拥有多大自由度分歧明显，特别是在 200 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内。中国和其他一些沿海国家坚持认为，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下，它们有合法的权利拒绝外国海军在专属经济区内进行各种所谓的“敌对”活动，包括监视活动。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拒绝这种解释。此外，

中国自己也在美国关岛和夏威夷附近的专属经济区内进行这些所谓的“敌对”海军活动（例如监视活动）。美国必须指出中国立场的虚伪，并坚持它有在 12 海里领海之外以非敌对方式执行任务的权利（包括常规的监视活动）。同时，美国应该减少它在中国专属经济区内进行监测活动的频率。许多这类活动可以通过其他更温和的方式实现。

第三点（一个无端的威胁或使用武力）会构成对联合国宪章的明显侵犯，它禁止这类行为的发生。任何武力威胁或将其他声索国赶出争议领土，却没有明确诉诸于自卫的企图，都将严重破坏和平，并引发地区和国际的强烈回应。中国必须认识到这一结果会破坏其“和平发展”政策，并将其和西方以及许多区域国家的关系置于危险的境地。尽管中国多次声明它致力于一个和平的谈判进程，但它从未明确地放弃使用武力。而且，中国过去曾经使用过武力将其他声索国从南海有争议的领土上驱逐出去，目前它也没有努力采纳一个有约束力的行为准则以避免今后发生类似的事件。因此，美国和其他国家应该敦促中国和其他声索国做出清晰、明确的声明，承诺他们不会无缘无故地诉诸武力。有人可能会反驳说，中国不可能在不损害其主权宣示或不破坏未来谈判筹码的情况下做出这种承诺。然而，如果中国将其不使用武力的承诺与其他声索国的类似承诺挂钩，并将其清楚地定义为一种不损害主权宣示的信心建立机制，那这种结果是可以避免的。

除了上述维护美国在南海利益的短期行动外，美国也应该采取一些具体行动以防止长期形势的进一步恶化。首先，美国应该停止强调用军事威慑的方法来防止现状的改变（将情况冻结在一个经常性潜在冲突的状态），并转而通过谈判让各方阐明其声索的性质，寻求领土争端的解决方案。这个解决方案应该遵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原则，阐明声索中领土和专属经济区的含义，或许可以仿照北极理事会成立一个南海理事会。

其次，美国应该私底下向中国明示，若中国仍旧不进行对话，不阐明其对九段线内水域声索的性质，不放弃无端使用武力，随着它在该地区存在和行动能力的增长，美国和其他国家将对冲最坏的结果，并采取相应的行动。具体地说，美国需要维持自身和其他国家的能力，来应对将来中国在该地区宣布事实上的禁区的可能性，或许还要动用武力保护一个盟友（菲律宾）。

第三，美国应该清楚地向中国表明，这种对冲需要美国显著改善同菲律宾、越南以及马来西亚的防务关系，并向它们提供武器。然而，美国的活动程度取决于中国澄清其声索以及接受行为准则的程度。中国也必须通过其言行清楚地承认不会用军事手段解决争端，

也不会未受到挑衅的情况下将竞争对手从占领地区驱逐出去。美国应该清楚地表明，如果中国采取了这些行动，并做出了这些承诺，美国会终止上述的对冲活动。

第四，关于有争议的声索的谈判，美国应该停止反对声索国之间的双边谈判，包括中越、中菲、中马谈判。并且它应该努力促成越菲、越马之间的双边协议，以减少它们面对中国时的差异。目前美国推动“协作”的努力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除中国外的声索国缺乏协调。

最后，这个问题十分紧迫、重要，需要在两国政府的最高层进行讨论。它需要出现在习近平主席9月访美的议程中。两国元首和其助理应该就各方关切、紧张局势以及可能结果达成一个更清晰、更细致的理解，并致力于承担相互担保以避免局势升级，而不应该仅仅交换双方的官方立场。随后较低层级的军方和民间部门可以深化这一担保。

美国和中国必须超越激烈的言辞，并构建去军事化、缓和南海紧张局势的基础。如果不这么做，当前的行动可能会导致一个更加危险的局势，而这将会是很难逆转的。

Carnegie endowment

译者 / 袁晓

另眼看中国：来自非洲、拉美以及欧洲的观点

Amadou Sy, Harold Trinkunas, Philippe Le Corre and Yun Sun

中国的亚太邻国是带着一定的焦虑来看待中国崛起的，这源于中国战略目标的模糊性。特别是在亚洲的一些国家和美国，政治和战略上的忧虑驱动着对中国的看法。据 2014 年的皮尤全球研究显示，在美国只有 35% 的人对中国持良好印象，而在日本则为 7%。

通过贸易、投资以及基础设施融资等渠道，中国的经济参与极大地促进了这些地区对中国的正面认知。随着中国持续地发展并扩大其在全球的经济政治活动范围，了解中国受欢迎的原因，以及每个地区挥之不去的担忧，对美国是至关重要的。每个地区的态度是有细微差别的，并受制于中国政策与实践的不断变化。

非洲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没有什么地方对中国的公众舆论比非洲的更积极。这个结果并不令人惊讶，因为中国是在非洲大陆追求经济转型，需要强大经济伙伴时参与非洲事务的。

确实，在后独立时代耽搁了很长一段时间后，非洲国家只能于 1990 年代重新开始发展经济，但势头强劲。安哥拉、莫桑比克、埃塞俄比亚以及卢旺达等非洲国家甚至连续 25 年维持了 7% 以上的 GDP 增长，加入了“增长奇迹”俱乐部。但若要达到亚洲的收入水平，非洲国家需要进行经济转型，以实现一个更可持续、更具包容性的增长。这一议程首先从填补非洲巨大的基础设施缺口开始。

非洲经济增长的这一背景对于理解非洲对中国的正面认知是很重要的。确实，通过双边贸易和对外投资，中国近年在非洲的经济参与急剧增加。诸如安哥拉（它一半的石油是出口到中国）等国在贸易上严重依赖于这一新的经济伙伴。中国的投资分散于相对广泛的部门（不仅仅是自然资源）和国家（从脆弱的国家到中等收入国家都有）。中国也是非洲基础设施的主要融资方，在铁路等部门中国是唯一的参与者。

然而，中国在非洲越来越多的经济参与并非没有招致过批评。例如，对于侵犯劳工权利的担忧，本地化程度较低的投资，贷款给非洲国家时透明度不足（特别是在用这些贷款交换自然资源时），这些问题都被全球媒体大力传播。

非洲需要经济伙伴关系，而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范围参与到非洲大陆的经济中来。因此，非洲正通过中国变得越来越全

导读 >>

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在世界各地进行投资。同时，中国人与世界各国人民的交流互动也变得愈发紧密。那么，外国民众对于中国究竟持有怎样的态度？来自非洲、拉美以及欧洲的几位学者对此进行了分析。总的来说，非洲人民对中国的看法最正面，拉美次之，欧洲最差。

球化。这些都促成了非洲大陆对中国较为积极的认知。

拉美

拉美对中国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受经济因素的驱动，而近期的中拉关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从2000年到2013年，贸易增加了22倍，从120亿美元增至超2700亿美元。1990年至2009年间，中国对拉美的投资总共只有70亿美元。2010年后，中国每年在该地区的投资介于100亿至140亿美元之间，巴西、秘鲁和委内瑞拉是最大的投资接受国。

中国与拉美的贸易、投资还会继续增长：2015年1月，在首届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论坛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到2019年实现贸易额5000亿美元的目标。中国需要拉美的产物，而拉美也需要中国的资本和投资——特别是在基础设施领域，中国有着非常多的国内经验。

但并不是所有拉美人都积极地看待和中国的关系。拉美的制造商将中国公司视为不公平的竞争者，而且他们认为进入中国市场有着许多非正式壁垒。中国主要需求的是大宗商品，因而拉美的农业及矿业从中获益颇丰，相关经济部门也得到了加强。但拉美过去曾过度依赖这些部门，这会阻碍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对于农业和矿业的投资已经引发了其和一些地区的工会、环保主义者以及土著权利活动人士的纠纷。中国不附加条件的贸易和投资政策也使得拉美最民粹的政权获益（如阿根廷、厄瓜多尔以及委内瑞拉），它们的领导人因此能够追求一些不利于宏观经济稳定、民主以及人权的公共政策。

所以虽然拉美民众对中国的认知往往是积极的，但中国要提升其软实力还是有着许多障碍。

欧洲

近来，中国已经成为欧洲的一个活跃投资者，它2014年投资了180亿美元，高于前一年的100亿美元。中国似乎对所有欧洲国家（尤其是英国、意大利、德国和法国）的能源、房地产、汽车、食品、零售、保险、机场基础设施等领域感兴趣。

矛盾的是，两个接受中国投资最多的欧洲国家——德国和意大利——对于中国的认知最糟糕：据2014年的皮尤调查显示，只有28%的德国人对中国持正面看法，而在意大利这一数据只有26%。一方面，欧洲领导人想要中国的投资；另一方面，皮尤采访的许多欧洲人并没有将中国视为一个可靠的伙伴。

在法国也存在着一个类似的矛盾：根据2012年的一项调查，法

国人承认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大国，但他们对中国的体制和公司知之甚少，心存疑虑。对中国这个国家，法国人没有表现出积极的情绪，但他们对中国人持正面看法（勤劳、有纪律、友善）。他们也并不知道很多中国品牌。

这些消极的看法似乎很难修正。导致不信任的主要因素可能是信息的匮乏，或者说积极信息的匮乏。欧洲媒体并不报道中国的正面新闻。中国在欧洲的软实力输出并不是很成功，投资也相对有限（中国占欧洲外国直接投资的比例为3%），但相较于前者，后者更有助于改善中国的形象。为此，中国需要承诺进行长期投资，创造工作和就业机会；换句话说，就是要做它希望外国投资者在本国领土上做的事情。所以，忘记软实力，还是专注于经济实力上吧！

www.brookings.edu

译者 / 袁晓

中美能创造一种惠及所有人的新商业文明吗？

Patrick Mendis

早在十九世纪美国受到天定命运论的鼓舞扩张到太平洋之前，中国就已经有了自己的天定命运论，那就是从西安这一中央王国的古都向西扩展的丝绸之路。在美国，天定命运论是一种国家信念，它认为向西扩张至太平洋以获得土地、提取自然资源、传播美国的德行与文化价值观是其神圣的使命。

最近，一些美国高级官员援引这一神圣的指示来描述中国在南海和东海的武断行为。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在2014年2月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一场听证会上表示，中国“在维护其认为的天命所在之地时颇具进攻性”，所指的就是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行动。

据《纽约时报》报道，在2015年2月出席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前，克拉珀重申，中国正在扩建其南海的前哨站，使其可以停靠船只，并可能在上边修建机场，这是中国越来越“咄咄逼人”地行使国家主权的部分行动。该委员会主席，参议员麦凯恩强调了美国对中国的填海活动，以及中国与诸如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台湾等周边国家因岛礁争端而日趋升级的紧张局势的担忧，并提供商业卫星图片证明中国过去一年在南薰礁的扩建行为。2015年5月，贝拉克·奥巴马总统将最先进的P8-A海神反潜巡逻机派去监视中国在南海新建的人工岛屿。

然而，对于这些活动的阐释，以及对于东海、南海的担忧，有助于我们理解与中国相关的外交议题的复杂性，尽管这种理解并不完全。人们既可以将这些活动简单地视为对天定命运的追求，也可以将其视为对于门罗主义的一种实践，这取决于观察这些纠葛的视角。

你的观点取决于你的立场

克拉珀对“天定命运”的使用显然是从美国的经历中借用过来的，这种修辞是为了告知国会的领导人，正如美国曾经有过的、要将西部边界扩展至太平洋乃至更远的领土野心一样，中国同样有着自己的领土扩张战略。在西方眼中，中国与日本持续不断的冲突（该冲突因为中国于2013年11月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而升级了），以及其在南海咄咄逼人的填海计划，是中国打算对其东部边缘的海空取得绝对控制权，并成为地区霸主的初步证据。约翰·加斯特于1872

导读 >>

作者认为，贸易是超越宗教、种族和语言，为人类所共享的价值。尽管中国和美国都有着自己版本的“天定命运论”，但贸易将两国绑定在了一起。若是中美因海洋领土争端而爆发冲突，所有国家都会是输家。未来的中美关系将建立在一个更繁荣的商业文明的基础上，它会增加所有人的福利。

年创作了一幅名为《美国进步》的油画，可以想象一下它的中国版——额头上有着锤子镰刀的精致少女以共产主义的名义行走在东海和南海上，而它所有的反对者都节节败退。

然而，在中国的叙事中，东海的钓鱼岛（日本称尖阁列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其当前的主权争端是二战的结果，中国必须收回它。至于南海，U型的“九段线”有着夏朝、汉朝的记录，以及1947年国民党政府绘制的地图作为根据，因而中国对这片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尽管没有一个正式的主张能支持九段线。从本质上说，中国正在跟随美国的脚步，在东海和南海上奉行自身的门罗主义。值得注意的是，不管中国做出了什么声明，一直到最近，其都没有在军事上或经济上行使这些海上领土的主权。

随着对抗变得越来越激烈和动荡，中国似乎感到受到的掣肘越来越少，不必再局限于通过外交手段进行谈判。中国现在拥有数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和不断增强的军事投射能力，因而它似乎觉得米洛斯对话比谈判更有用、更高效。美国方面，它继续奉行着航行自由原则，并对中国的活动进行监控。当相互之间的这种敌意与常规的商业交通交织在一起时，类似于1983年大韩航空007航班在日本海被苏联苏-15截击机击落的事件是很有可能发生的。

南海与东海的重要性是难以估量的。世界上超过一半的油轮和商船经过这片海域。它是世界上最繁忙的十大集装箱运输港口之一。在资源丰富的南海与东海周围，是需要能源进口、并以出口为导向的亚洲四小龙。这些经济体的贸易、运输也与美国等其他太平洋国家联系密切。若是该地区有冲突，那么几乎所有人都会是输家，而不会有明显的赢家。接下来的问题是，谁会从该地区一场潜在的战争中获益最多？太平洋两岸的政策制定者是会联合起来寻求一项已经让数百万人脱离赤贫的公共产品，还是说我们都会像帕斯卡在《沉思录》中所警告的那样，“对已经得到的事物视而不见，反而掉以轻心地落入深渊”？

不可调和的差异？

很难让人相信像中美这样在哲学、政治和文化上针锋相对的两个国家可能有共同的价值观或利益。首先，美国只有240年的历史，跟中国的年纪比起来，这差不多就是一个舍入误差，尽管已故的周恩来总理1971年第一次会见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时，以一种安抚的口气向美国暗示中国比美国年轻得多，因为新中国建立只有22年。美国是一个多语种的社会，而其历史上很大程度上是犹太教、基督教的。美国最初的建立是因为美国人寻求摆脱欧洲殖民势力的枷锁，因而美国的国父们创造的是一个“在上帝庇护下，不可分割，所有

人都拥有自由与公平”的共和国。

另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已经存在了数千年的文明。麻省理工学院著名的汉学家白鲁恂先生曾经表示，即使以现代眼光看，中国仍然是一个“伪装成民族国家的文明”。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同质的社会，它有着悠久而多样的宗教、哲学信仰，而这些信仰又受到道家传统与儒家价值的影响。经过数个世纪的军阀混战、意识形态斗争后，中国最终在共产党的毛泽东主席领导下于1949年统一为一个民族国家。

考虑到这些历史差异和政治取向，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很大程度上被沙文主义的喧嚣所淹没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的国父们认可过中国的早期贡献。本杰明·富兰克林蔑视欧洲列强侵略美洲殖民地的行径，他转而向中国寻求灵感，并表示“中国被认为是一个古老且高度文明的国度。”富兰克林进一步暗示说，为了在美洲建立一个“幸福繁荣的帝国”，他希望美国处于有学问、有道德的精英治下，而这正是“孔子向诸侯们所提议的”“儒家模式”。大陆会议秘书，查尔斯·汤姆森写道：“如果我们能幸运地引进中国的产业、生活艺术、改进过的畜牧业以及当地的植物，那么美国可能变得和中国一样人口众多，能容纳更多的居民”，“美国因此会变得更好，远超人们的预期”。其他人，比如乔治·华盛顿为他的维农山庄进口了中国植物，托马斯·杰斐逊为他在蒙蒂塞洛的住宅选择了中式的建筑设计。横贯大陆铁路不仅是使用中国劳工建造的，还从伍秉鉴手中获得了资本投资。他是中国最富有、最强大的行商商人，对美国铁路进行了大量投资，并和约翰·穆雷·福布斯家族保持了有利可图的贸易关系，而后者正是美国国务卿约翰·福布斯·克里的先祖。

然而，中国后来对西方的贡献很大程度上因为冷战史的叙事而被抹消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是第一个面对日本侵略的国家。在缅甸，它与美国、英国并肩战斗，努力保护史迪威公路（云南境内通往昆明的一条物流要道）。战后中国获得的奖励是联合国安理会的一个席次，这几乎不能补偿中国付出的代价：数千万人在日军的暴行下丧失生命、流离失所，包括被抓去进行生物实验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数千中国人代表同盟国在法兰德斯战场上献出生命，数千人被埋在利物浦和英联邦战争墓地。总共一万四千人在西线挖壕沟，在兵工厂、码头、铁路战场工作，或是担任口译。一战史是很难将中国劳工纳入进去的，他们因此被称为“被遗忘中的遗忘”。

因为近期东海、南海的冲突，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其他一些抓人眼球的新闻，人们的注意力已经从这些中国做出的贡献，转向了预言家们所宣称的中美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这不仅危险，

而且短视，因为两国在许多重要领域有着共同利益，这事关国家福祉和核心利益，也是国际社会在二十一世纪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这一共同利益数千年来就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也是美国诞生前就存在的历史叙事的一部分。然而，这并不是中国人或美国人所独有的。它是人类所固有的，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之一。它就是人类进行贸易商业交往的天然渴望。

历史背景下的天定命运

1776年3月，就在大陆会议宣布脱离大英帝国前几个月，亚当·斯密出版了《国富论》。在书中，他观察到，因为劳动分工，人类“以物易物，物物交换的自然习性”得到了发展。因而，与他同时代的国父之一，托马斯·潘恩，会宣称“我们的计划是商业……这个新成立的共和国的贸易总是会受到保护”，也就不足为奇了。

国父的这一洞见被庄严地载入美国宪法的贸易条款（与外国的贸易、各州之间的贸易以及与印第安部落的贸易），它将十三个存在着宗教、民族和种族分歧的州绑定在了一起，就像受贸易驱动的古丝绸之路扮演了“世界性中国”（公元618-907年的唐朝，中国辉煌的顶峰）的“大熔炉”一样。1784年，也就是美国宪法通过的三年前，“中国皇后号”从纽约下水，驶往广东（广州），这一天也是乔治·华盛顿总统的生日，这标志着美国的贸易政策取向以及对欧洲的疏离。确实，从波士顿到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大量富裕的美国家庭因出口美国西洋参和皮毛，进口中国茶叶、丝绸和瓷器而繁荣兴盛。

中美之间这种颇为平和、互利共赢的贸易投资关系一直持续到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当时，双方都开始关注内部事务，中国专注于解决太平天国起义（1850-1864），而美国内部关系的破裂引发了南北战争（1861-1865）。

在促进商务的同时，国父们也告诫到要小心外交纠葛。在乔治·华盛顿总统的告别演说中（1796），他警告说，“我们处理外国事务的最重要原则，就是在与它们发展商务关系时，尽量避免涉及政治……我们真正的政策，乃是避免同任何外国订立永久的同盟。”杰斐逊也在他的就职宣誓中说，“与所有国家保维持和平、进行贸易、真诚相待，但不参与任何联盟。”1803年美国购得路易斯安那后，杰斐逊给梅里韦瑟·刘易斯上尉和威廉·克拉克少尉的远征队下的几个特殊命令之一，就是要他们寻找“最直接、最可行的水路通道，穿过大陆，抵达太平洋和中国，以满足商业目的”，并实现杰斐逊“通过商业交往”建立“自由帝国”的愿景。

自由帝国还是天朝大国？

因此，美国从东部大西洋沿岸向西进发的这种使命，和中央王国的“天命”一样都是很自然的现象。太平洋两岸的信仰体系本质上都是与天命（把皇帝描绘成“天子”）或“自然神”这类的概念有关。美国的建国文件将自然的上帝这一概念视为神圣，这种对上帝的信仰是基于对自然的观察，而不是通过任何特定的宗教。

天定命运论确实给美国留下了伤疤。土地兼并导致了与墨西哥和西班牙的战争，使印第安人流离失所（甚至在“泪水之路”这一声名狼藉的时期之后情况依旧），加州淘金热时期还引发了与西部定居点的中国移民的紧张局势。那时流行着这样的口号：“是神的旨意让美国扩张到太平洋。”为了创建一个自由帝国，美国的西部边界扩展至了夏威夷，随后是菲律宾、关岛以及其他一些太平洋岛屿。

在太平洋的另一边，中央王国长期以来一直有着用商业和企业创建一个“天朝大国”的信念。通过古丝绸之路商业网络的扩张以及朝贡贸易，中国的这一理念在欧亚大陆乃至更远的地方得到了实施。丝绸之路的长度超过 4000 英里，其名称来源于汉朝（公元前 206- 公元 220 年）以来中国与中亚、南亚利润丰厚的丝绸贸易。

大量外国商人以及代表不同宗教信仰的传教士为了精神上的满足以及商业目的来到中国。伴随着佛教、儒教、道教以及其他宗教分支（比如景教）崇拜圣地的出现，古都西安以及其他诸如成都、桂林、杭州、兰州、洛阳等商业城市也得到了发展。从长江、黄河、珠江等主要河流的港口出发，中国的船只穿过南海和印度洋，抵达非洲、亚洲和波斯湾地区——比哥伦布（意大利探险家，生于 1451 年，发现美洲）早得多。

直到清朝终结的 1911 年，中国使用的还是外圆内方的金属钱币。方形代表大地，圆形代表天空。这种商贸媒介实质上象征着宇宙的天地合一，在这个宇宙中，天朝大国需要向西扩张，并允许其他地区的文化在中央王国内部的不同地区进行交流和贸易。商业和外交权力的中心位于皇帝的龙椅上，它象征着至高无上的和谐、和平与繁荣。

随着《西游记》在明朝（公元 1368-1644 年）的出版，丝绸之路和商业文明的扩张在中国成为了传奇。这部中国经典小说的核心人物，玄奘法师，是唐朝时沿丝绸之路前往“西天”的佛教僧侣。在他十九年有记录的旅行中（公元 626-645 年），这位博学的僧侣遍游中亚和南亚（最远至斯里兰卡），见证了一个“世界性中国”的崛起。来自各国的商人和朝圣者在丝绸之路沿线共同创造了一个商业文明。

《西游记》的传说已经从本质上根植于中国人的意识以及禅宗（结

合了儒、道、释三家的哲学和仪式)之中。后者是从佛教的发源地斯里兰卡、尼泊尔以及古印度传来的。繁荣的唐朝代表了横贯大陆的商贸力量，而正是这种力量使得中国真正成为了天朝大国。

明朝时(公元1368-1644年)，一位来自云南并有着蒙古血统的虔诚穆斯林信徒，海军指挥官郑和，进行了七次著名的探险(公元1405-1433年)。他穿越印度洋，抵达了非洲东海岸和中东(包括沙特境内的穆斯林圣地麦加)。他的主要目标是向遥远的文化宣示中国的辉煌，宣称天命归于皇帝，并拓展天朝的朝贡体系，发展友好的外交和商业关系。尽管郑和这几次相对和平的航行既没有重大意义也不具变革性，明朝在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期的海上发明与航海技术还是被歌颂为有历史意义的、有创业精神的、优于西方的。

尽管这些陆上、海上线路的性质、起源在不同的发展的阶段都各不相同，但明朝和唐朝这两个历史案例对于发展一种“中国例外论”和天朝上国复兴的观念还是很有力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习近平主席雄心勃勃的丝路贸易战略(例如“一带一路”政策)，从某些方面看其实就是中国要在21世纪恢复一种古老的“天定命运论”。

中美关系在两次世界大战后、在冷战期间、以及在诸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期间出现了倒退。而且，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与相互之间的误解阻碍了两国商贸往来的恢复，直到两国关系于1972年正常化后才得以复原。随着邓小平主席在1980年代实施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开放，以及中国在克林顿总统时期加入美国主导的世界贸易组织(WTO)，中美之间不断增长的商业互动已经是互利共赢的，并且驱动着世界经济创造出了一个全新的全球中产阶级——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成就。

丝绸之路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一个愈发自信，并且相信自己天命在身的中国，在外界看来和19世纪的美国没什么不同。但人们不应该假设军事冲突是必然的结果。尽管美国的担忧是有道理的，意图可以一夜之间就改变，而能力需要数年时间来建设；但是，亨利·基辛格曾经指出，“冲突是一个选项，但并非必然。”

在美国，五十个州之间，以及州与联邦政府间的紧张冲突时常存在。事实上，这就是美国以及美国宪法商业条款的天性和真实情况。挑战和悲剧往往代表着创造和创新的机会。通过商业和贸易，这个国家保持了其完整性。同样地，尽管西藏藏族、新疆维族、香港和澳门本地人以及中华民国台湾都在斗争，但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人长期以来对古丝绸之路战略的观念，以及通过朝贡体系维持儒家统一的商业历史，都在驱动着中国前进。

这一延续了千年的帝国朝贡制度影响了中国的贸易伙伴以及周边邻国，使得它们自然地倒向中国中心的世界秩序。这一兴盛了多朝，直到清朝初年后才渐趋衰落的古老传统，仍旧可以用来支持习近平主席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设想。和这个倡议一道，还有一大堆中国领头的基础设施发展计划，以及在亚洲乃至亚洲之外的贸易战略。

如今的西方媒体倾向于炒作中美在南海和东海的争端，而对中美关系取得的进展一笔带过。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以及中美商贸联合委员会的设立只是高层接触的两个例子，而这种接触对于合作至关重要。事实上，中美的分歧与经常出现在美国的州际商业冲突，或是与印第安人的土地、经济权利纷争并没有什么不同。奥巴马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习主席的新丝绸之路以及大量自由贸易协定（中美各自参与的一些双边和地区协定）所使用的贸易竞争和战略合作，需要透过商业理念、自然神、天子的角度才能得到理解。这些隐喻通过商贸将人们团结起来，而不是靠宗教、种族、意识形态或是某种共同的语言。

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的创立，使得 TPP 和丝绸之路间意味深远的国际商业竞争出现在了全球舞台上。这些构造事件向美国提出了一个有远见的问题：我们首都那些杰斐逊式的领导人能否创建一个自由帝国，或是只用军事力量和工业能力能否追寻到一个汉密尔顿所主张的世界？两国的历史都清楚地表明，贸易能将人们团结在一起，而宗教、种族、语言却不能。通过和平的贸易与工业，中国名义上的“共产主义”政权与“民主的”美国似乎被一个共同的商业联系绑在了一起。

为了“相互依存”的和平而进行贸易

太平洋两岸博学的政策制定者将会采用镜像贸易战略，并承认中美关系乃是消费者与生产者、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美国的自然神论或是中国的天命论意味着，中美商业互动需要对相互依存的贸易外交保持谨慎，以维持“相互依存的和平”。通过 WTO，全球贸易体制可以很好地扮演争端解决机制的角色，但它无法解决贪婪的或是报复性的竞争，或是军事威胁。作为二战后全球治理体系的设计师，美国前总统杜鲁门说过：

“当堪萨斯和科罗拉多因阿肯色河的水而发生争执时，它们不会出动各自的国民警卫队并因为这件事打上一仗。它们会向美国最高法院提起诉讼并遵守其判决。没有理由我们在国际上就不能这么做。”

就像五十个州必须要解决州与州之间以及州与联邦政府间的争

端，美国和中国也必须要反思各自的天定命运论，以开创一个全新的商业文明。这一文明本就是自然神和天命要赠予它们的。当杜鲁门总统说道“各国在一个世界共和国中和睦相处会跟我们在美国内和睦相处一样简单”时，他似乎抓住了这个命中注定的愿景。尽管在主流意识形态上存在差异，但美国建国计划选择共和政体而非民主政体，就注定了美国会通过商贸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捆绑在一起。中美之间潜在的冲突与分歧必须用与杜鲁门那句格言类似的方式进行解决。在这种方式中，美国州际商业争端得到了和平的解决。

因此，未来的中美关系将建立在一个更繁荣的商业文明的基础上，它会增加所有人的福利。美国宪法的序言强调“我们合众国人民”“为建立更完善的联邦”，需要“促进公共福利”，并“使我们自己和后代得享自由的幸福”。这个文本似乎反映的是《礼记》中孔子（公元前 551-479 年）曾表述过的，关于理想的儒家社会秩序——天下大同——的理念：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幼有所长……”

换句话说，这个“天下为公”的概念也可以被解释为“人民是权力之源”或“让这个世界变得公正，并为所有人共享”。通过援引儒家哲学，习主席在 2015 年博鳌论坛上向听众阐释了中国对于太平洋秩序的新看法。这种秩序包括“一个和谐稳定的国内环境以及一个和平安宁的国际环境……中华民族历来爱好和平，自古就崇尚‘以和为贵’、‘协和万邦’、‘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等思想。”后者与托马斯·杰斐逊写于美国《独立宣言》中的“人人生而平等”产生了共鸣。在杰斐逊看来，应该通过商业联系来建立一个自由帝国。

出于对国父们应有的尊重，也许值得考虑下，美国既不是一个民族国家，也不是一个文明国家，它是世界的一个复制品。建立美国文明的最初愿景，似乎已经迷失在金钱与政党政治中了。摆在明智的美国领导人面前的问题是：这个“不可缺少的国家”是否应该退回到其最初的愿景，并通过一个商业文明来创造一个惠及全球公民的、杰斐逊式自由帝国的翻版？更重要的是，如果按照当前的轨迹发展下去，这个“不可或缺的国家”是否还将在人类事务中不可或缺？

hir.harvard.edu

译者 / 袁晓

中国的国际增长议程

Michael Spence

在过去的 35 年中，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已经将注意力集中于国内经济，而改革的目的是让市场更加有效率，并且提供准确的价格信号。虽然他们不得不逐渐意识到他们国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但他们并没有任何战略，以确保中国的邻国在其经济转型中受益。

但现在中国确实有这样一个战略，或者至少正在迅速制定这样一个战略。此外，它将目光投向亚洲以外的地区，包括东欧和非洲东部的海岸线。

中国的战略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最近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去年成立的金砖新开发银行（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两家银行，很明显，是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替代，即竞争对手。

对于新战略同样重要的是两个前瞻性现代丝绸之路：陆路，经中亚到黑海；“海上丝绸之路”，通过南中国海，马六甲海峡，横跨印度洋到东非，并从那里通过红海到地中海东部。

经济学家有时把全球经济描绘成一个巨大的集市。但其实它不是，它是一个网络。在这个网络中，通过扩大商品、服务、人、资本的流动，以及重要的信息，这些链接是建立在网络上的。中国的目标是创造这些链接，它拥有大量的资产，这将使它成为全球增长和发展的催化剂。

最明显的资产是中国庞大且不断增长的国内市场，其他经济体通过贸易和投资可以获得进入。因此，中国将加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为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提供出口市场（和就业机会）。此外，因为中国已经建立了投资的能力，目前其国内经济现可以吸收这部分投资，但将来不可避免地，中国会寻求国外机会，无论是公共和私人投资。特别是中国企业，将越来越多地希望建立自己在国际上的品牌知名度。

对参与 AIIB 和新的开发银行，中国已发展了大量的跨国战略。虽然有怀疑者，但普遍认为好处大于风险，对于 AIIB 持支持态度。中国的举措可能有助于建立一个对所有人开放的网络。毕竟，贸易和投资不可能全部经由中国。

同时，通过与其他中央银行（第一次是在与韩国在 2008 年 12 月）的 30 多个货币互换安排，中国是利用其外汇储备来帮助其邻国来抵

导读 >>

中国的国际地位将以一种被认为是有利于邻国和世界的方式出现。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战略的新的外部焦点是为了使这一愿景成为现实。

御国际资本流动波动。这与当局努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努力密不可分。人民币正迅速扩大其在贸易结算中的作用。用贸易伙伴的货币来结算，则效率高，不需要中介，例如有美元。

当然，实现人民币国际化还需要很多努力，不仅需要大的，流动性强的国内金融市场，还必须建立信任和信心。这需要时间，但中国已经申请 IMF 对人民币包括篮子货币基金的单位账户的价值决定，特别提款权，决定可能在 2015 年年底敲定。

加入美元，英镑，欧元，日元所在的“SDR 俱乐部”意义重大。更重要的，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同，这需要实质性的改革，满足的条件加入 SDR 即承诺向全资本账户自由化迈进，从而加快对人民币完全可兑换的速度。

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需要看得长远。他们的战略无疑将在未来几年面临障碍。问题在于，现在的策略是否值得实行。

答案几乎是肯定的。例如，陆上的“丝绸之路”会减少中国对海上通道的依赖。因为海上通道可能会被阻断或破坏，尤其是在马六甲海峡。更普遍的是，中国的投资将缓解对丝绸之路经济的限制，解决部分发达经济体增长缓慢和投资不足。最终，该地区的蓬勃发展的经济将有利于中国经济稳固它的地位。

许多人认为公共部门投资是利用全球经济生产资源，提高其效率和增长潜力的一个很好的途径（也许是最好的方式）。但这需要多国努力。中国领导人肯定要承认自己国家的全球地位。但他们也希望中国的高收入地位以一种方式出现——被认为是有益于邻国和世界的一种方式。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战略的新的外部焦点是为了使这一愿景成为现实。

www.project-syndicate.org

译者 / 陈卿芸

马克思·费舍尔将“很难得到帮助”的故事运用于中国

Center for Economic and Policy Research

似乎不熟悉生产力增长的人不在少数。其实这是一个相当简单的概念。这意味着工人可以在每小时的工作中产生更多的产出。世界经济已经保持超过二百年的生产力增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我们比我们的祖先活得更长。

当我们听到人们说，机器人将承担所有的工作，这是一个生产力增长的故事。这个论点是，每一个工人都能在一天的工作中产生更多的工作，因为她是在生产力超级强的机器人旁边工作的。如果这些人听到生产率增长的话，那么他们就会知道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有任何理由来相信生产率增长率将以更快的速度增长，而且这种增长速度是否会导致大规模失业。

答案当然是“不”，生产率的增长在最近几年已变慢，本应该加速到比 1947-73 黄金时代的增长率还高 3%。这是一个低失业率和工资增长的时期。虽然有一个高失业率和工资停滞的使其，但这是源于糟糕的美联储政策、糟糕的货币政策和糟糕的财政政策。这不是机器人的过错。

昨天华盛顿邮报刊登了马克思·费舍尔的一篇文章，里面展现了不一样的中国。费舍尔认为中国人口危机是源于其低人口增长率。未来没有足够的劳动力去支撑老龄人口。中国面临着高速生产力提高和工资极高。这意味着虽然支撑老龄人口的劳动力少了，但是工人和退休人士都可以享受到很好的生活。

简单的算术就可以得出结果。假如中国从每一个退休人士拥有五名劳动力到每个退休老人只有两个劳动力，只需要 20 年。这种速度是中国不能预见的。现在假设他们的生产率和实际工资的增长率是 5%，比他们实际看到的要慢得多。而且，假设一个退休人员需要一个普通工人的收入的 80%。

在第一年，一个工人将不得不支付不到 14% 的工资，以支持退休人口。如果我们把他们的税后工资为 100，这让他们们的税后工资为 86。到二十年的税率将需要几乎 29%，为 2 工人提供收入，这是等于 80% 的工人税后收入。听起来很吓人，对吗？

是的，20 年的工资比去年高 165%。这意味着，税后工资将是二十年前的两倍。我们的退休人员也将有超过他们二十年前收入的两倍。危机在哪里？

此外，这是一个低点。一旦达到每两名工人支撑一名退休人员，

导读 >>

中国面临人口危机——人口增长放缓，然后下降。未来不会有足够的工人来照顾老龄人口。并且奇怪的是，即使如此，依据目前中国的国情，未来工人和退休人员仍然可以享受大幅提高的生活水平。

之后比例变化将不大。这个国家并没有继续老龄化，或者老龄化至少是一个非常缓慢的速度。但生产力继续增长。如果从起点出发走三十年，那么工人的工资水平指数将会超过 300（在生产增长率为 5% 的情况下），超过初始水平的三倍。即使生产增长率为 2%，20 年后的税后工资指数为 230，近 170%，比三十年前工人的工资高出许多。

这是一个实际问题，劳动力供给减少就意味着生产力最低的工作没人去做。没有人在午夜的便利店工作。很难找到人帮你修剪草坪或打扫你的房子。生活变得艰难。

www.cepr.net

译者 / 陈卿芸

城市化是印度落后于中国的原因

Yukon Huang

期望很高，印度最终将通过结合穆迪魔术、丰富的年轻劳动力和更自由的政策制度充分发挥其经济潜力。根据最近的会计调整，印度声称它可能已经取代了中国，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然而，如果印度想实现和中国相同的成功，要看一看为什么在城市化过程方面相比中国失败那么多。

四年前，这两个人口最多，贫穷的国家也面临着类似的经济前景。随着他们的劳动力大部分停留在自给农业和相对稀缺的自然资源种，其发展成功或失败将由他们的城市化过程定义。1980，印度是的城市化水平为 25%，远超中国 20% 的城市化水平。今天，中国已翻了一倍，城市化水平达到 53%，而印度只有微升，达到 32 %。而在这个水平上，印度的贫民窟却更普遍了。有些人认为中国甚至可能达到了城市化饱和点。

中国的快速工业化带动城市化进程，真实工资持续的两位数上涨，这使得约 6 亿农村人口摆脱贫困，占该国一半的 1980-2010 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10%）的一半。相比之下，尽管其服务业的发展令人印象深刻，但印度还没有成功地开发出一个充满活力的制造业，它的大部分劳动力仍然局限于低生产力的农村活动。

因此，城市化进程对印度发展议程的重要性之大也就不足为奇了。目前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改善城市机构，教育和市政融资，以鼓励更大，更有生产力的城市发展。但大部分没有做好。中国的成功，尽管其机构不强，但与印度不同的是，它仍然有严格的户籍制度阻碍了农民工迁徙到城市商业中心。然而，之于今天的印度，更为动态的，生产率驱动的城市化过程并不存在。如果要建立这种动机，就需要更好地了解问题的本质。

印度之所以失败，而中国之所以成功的原因，可以用简单的指标来说明：它们各自的比例，城市的收入和城市的价格。

收入的比例关系到城市与农村生产力的相对差异性。对于中国，这个比例是 3.2，世界最高。平均而言，城市工人的生产效率超过三倍，因此也得到相应的高补偿。难怪有 2.7 亿农民工涌入城市，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印度，同样的算法给出了比例为 1.6，新兴市场经济体中最低之一，表明城市生产率只有适度高于农村，城市不提供有吸引力的收益。

另一关键指标是中国与印度房地产价格的相对差异。中国的特

导读 >>

印度城市化在近 20 年来进展缓慢的原因：其一，中国的城市收入与农村收入的比例要大大高于印度的比例；其二，中国城市的房价要远远低于印度城市的房价。这两个主要原因使得印度的农村人口不愿迁移到城市生活。只有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印度才能更好发展。

大城市在过去的十年中，以人民币计算的价格上涨了一五倍，或近七倍。难怪有担心中国可能的房地产泡沫会主导全球金融新闻。尽管这些增长令人震惊，北京和上海的房价仍然只有印度新德里和孟买的一半。

所以因为生产率有关的好处是如此之低，在印度，农村劳动力迁移到城市的激励是远远低于中国的，这是由于过高的房地产价格加剧了在印度城市生活相对较高的成本。这些与其他因素相结合的价格膨胀的房地产价格，尤其是物流瓶颈，使印度的生产商在全球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尽管他们的工资水平较低。净效果是阻碍了印度的进步。

更具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印度的低城市 - 农村生产率比率是由于其投资和定价机制中公认的扭曲导致的。但鲜有人知的是城市土地管理政策造成的负面影响。

印度过高的房价反映了两中古老的做法的结合。一是在保留其殖民地时期古老的传统，政府占据、利用大量宝贵的城市土地，包括庞大的公务员区域和军事营地，这十分浪费。另一个来自过时的和过于严格的建筑规范，这阻碍了商业活动和违背了在主要城市建设住房的核心。这将使得发展被推到外郊区，使其难以实现集聚效益，来推动生产力的增长。

除非这些问题得到解决，印度不能实现得益于更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增长，而中国和亚洲的很多地区在过去的四年实现的增长是以这个为特征的。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译者 / 陈卿芸

中国的幸福与健康：发展的悖论

Carol Graham, Shaojie Zhou and Junyi Zhang

在过去的 20 年中中国的经济增长、发展和减贫工作都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事实上，在这段时间里全球极端贫困率的下降主要也是因为中国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口脱离贫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家庭消费从 1990 年到 2005 年增长了 4 倍。中国在 187 个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数排名中上升了 10 位达到 93 位从 2008 到 2013，而且预期寿命也从 1980 年的 67 岁上升到了 75.3 岁。

然而，在同一时期中国的生活满意度却展示出了完全不同的趋势——特别是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初始阶段急剧下降，之后又有所恢复。而随之而来的是自杀率和精神疾病发病率的上升。在 90 年代中国有着世界上最高的自杀率：从 1995—1999 的每年每 10 万人中就有将近 23.2 人自杀（到 2012 年这一人数逐步下降到 7.8 人）。另一方面，精神疾病发病率的上升因为自杀率的下降（可能是因为更多的人去寻求精神治疗，而不是自杀）。精神病医院的住院患者人数从 2007 年到 2012 年每年以 13.4% 的比率上升（2012 年患者达到了 120 万人），门诊患者人数也以相似的比率 12.4% 上升（在 2011 年患者人数达到了 2700 万人）。

这是一个异常现象吗？关于中国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是否存在一些独一无二的东西？还是这就是中国的增长轨迹？当收入的指标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关于中国发展的故事，幸福感的指标——包括对精神健康的测量——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如何解释这些差异呢？

当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增长轨迹，中国的经济腾飞是因为中央计划的宏观经济管理被自由市场制度所替代，和社会福利和其他体制（尽管不包括政治体制）的变化。而中国的不幸福的增长故事即经济快速发展与人民幸福感的悖论在世界其他国家也同样存在。从长期来看，经济的增长通常会带来幸福感的上升，但在短期中它导致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的其他维度的下降。经济增长的速度和实质的变化往往使得安全感下降（对不同技能的奖励发生变化）以及不平等程度上升（在此过程中总有赢家和输家）。

几年前我们发现向阶层上级移动的调查对象在发展的经济体中对生活的满意度比收入没有发生变化的贫穷调查对象更低。

这一发现在中国更为明显，因为数以百万计的农村人口脱离了传统的安全体系向城市迁移以寻找新的机会。此外，尽管不是本文的重点，

导读 >>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发现虽然近 20 年来中国的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但居民的幸福感和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升，而在世界发展过度国家中中国的这种现象尤为突出。作者在随后探讨了其中的原因，发现其一可能是因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并没有进行相应的改革，没有进一步的民主化；其二，户籍迁移的人们更侧重于收入提高与收入不平等，因此虽然他们的收入从绝对量上来说有所提高，但相对于那些没有迁移，收入没有变化较贫穷的居民来看，他们的幸福感更低。

许多转型的经济体会并发地向民主政治经济体转型，但中国并没有。一般来说，在世界各国中政治自由度同幸福感是正相关的。在中国的这个案例中最明显的是一方面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减贫成果，另一方面是生活满意度朝相反方向发展的趋势（至少是在经济发展的初期）。

的确，早期的关于这种悖论的幸福感的文献和发现中，特别是与中国相关的，是关于“幸福的农民和沮丧的成就者”。几年前我们发现向阶层上级移动的调查对象在发展的经济体中对生活的满意度比收入没有发生变化的贫穷调查对象更低。这种趋势的部分因为上升的期望和伴随着向上阶层的流动获得新信息的途径增多。我们发现在相同的收入水平上沮丧的调查对象比那些不沮丧的调查对象更关注收入不平等。部分原因可能是反因果关系的，因为更加沮丧，不幸福的调查对象更可能去寻求改善他们的处境。我们最近的关于移民幸福感的研究则暗示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发现潜在的拉丁美洲移民（包括一些转型国家）比普通水平更加富有和教育程度更高，却更不幸福以及对经济现状更挑剔在移民前。那么一旦他们移民他们就会更倾向于努力提高幸福感。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利用了新的对中国幸福感的全国调研数据来探索可能会引起中国发展悖论的途径，研究数据除了生活满意度主要包括关于健康的详细信息（包括慢性和急性健康问题，以及焦虑和抑郁）、休息的充足度、闲暇活动的频率、教育、收入、婚姻状况、户口和住房情况。我们的工作同之前的关于中国生活满意度的研究是不同的，主要体现在探索精神健康与身体健康（慢性疾病）以及时间使用情况（休息的充足度或休闲活动的频率）之间的关系上。我们主要依据一些细节性的工作——作者之一 **Graham**——全球的生活满意度趋势、发展悖论、幸福与健康之间的关系，以及关于中国经济和公共机构的详细知识——作者是周和张。

我们发现幸福的决定标准在中国及世界的大部分国家是相同的。同时，中国关于不幸福和报道的精神疾病的现象在那些已经或将受益于经济转型和相关增长的国家中是很突出的——一个很明显的增长悖论。体现这种悖论的都是城市居民，有更高的受教育水平，在私企工作，没有充足的闲暇时间和休息。我们希望我们的发现能够对于已经做了大量的关于中国生活满意度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见解，特别是从幸福与精神健康角度。

Brookings Institution

中国对环境健康危机的应对

Yanzhong Huang

经过三十多年的快速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中国即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然而中国的经济奇迹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成本。由于缺乏环境监管和肆无忌惮的工业化中国三分之一的主要河流和60%的地下水都已被污染。像这样的环境问题持续严重地威胁着中国人民的健康和幸福。

中国面临着三个主要的环境健康危害：空气污染、水污染和土壤污染。早在2007年，一份世界银行的研究发现中国的空气和水污染的健康成本达到了中国GDP的4.3%。在2012年，PM2.5颗粒污染物，被认为是对人体健康最有危害的，且与由于中风，肺癌，冠心病和慢性阻塞性肺病而导致670,000例过早死亡有关。一份2013年的研究也发现空气污染与中国北方人们在出生时的预期寿命降低5.5年密切相关。与此同时，在农业和制造业广泛生产和使用的有毒化学品已经污染了大量的水资源和农田，导致出现了400多个癌症发病率非常高的“癌症村”。

影响社会稳定？

由中国环境健康危机引起的危害正在考验中国政府的弹性。巨大的社会成本正在抵消过去三十多年前前所未有的发展成果，当这些社会成本上升时，公众对环境健康问题的不满也随之上升，这将威胁到国家社会和政治的稳定。据中国官方消息称，从1995年到2010年，与环境相关的上访信件从58,678件激增到701,073件。中国顶尖的专家认为如果政府低效地去应对生态危机，那么很可能引起全国范围的抗议活动，而这会威胁到政权的生产。尽管中国的决策者有新的工具可以使用，如从国际交流中获得技术，但他们在应对环境安全挑战时必须面对一系列的复杂因素，包括压倒性的以发展为导向的领导，人口压力，世界经济的一体化，领导人对社会政治稳定的担忧。紧迫的健康问题需要一个多层次的政府管理，包括一个更一致的危机管理办法，财政和政府机构能力的提高以及利用社会能量的意愿。

在公众对中国北部创记录的PM2.5的一片抗议中，总理李克强在2013年3月对污染宣战。同年9月，政府颁布了一项防治空气污染的行动计划，目标是从2012到2017年降低至少10%的空气污染。2015年4月，北京公布了一项期待已久的计划，宣誓不仅关闭污染

导读 >>

作者在文中提出中国虽然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变为了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但其社会代价是巨大的，特别是环境污染：空气、土地、水资源污染。在其后作者提出近年来中国居民对环境的关注越来越多，相关的对政府的建议信件也相应增加，但中国政府在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处于一种两难的困境。同时，中国逐渐生成的两极分化的社会也会使得环境治理问题更加复杂。最后认为中国政府对于环境保护的预算支持仍然很小，与民间环保组织的合作力度也很小，中国政府需要在环境治理方面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

水资源的工厂，而且到 2020 年至少使七大流域的 70% 的水资源适合人类使用。

2015 年 5 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同时评估官员在经济和环境业绩的“意见”。而这项新政策似乎与依赖于经济增长来保持政权正统相矛盾。自 1989 年以来，中国一直受一个不成文的社会契约影响：政府需致力于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以保证共产党在中国的政治地位。因此中国领导人便陷入了一个困境：共产党必须保持经济增长在 7% 以上以保证就业和居民幸福。然而，这些同污染相对抗的新措施很可能会削弱努力维持 GDP 增速的效果（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最近的经济衰退加剧了这一困境。2015 年 1 月，中国的经济增速小幅降至 7.4%，二十多年中的最低增速。IMF 最近下调了中国 2015 年的 GDP 增速预期至 6.8%。就在上月，中国财政部长警告说除非中国保持 6.5% 以上的经济增速，否则中国有超 50% 的概率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已达到中等收入的国家长期停留在这一水平，不能进入高收入的发达国家行列。

最近的报告发现中国的反污染措施正在对受经济放缓影响的区域的企业活动带来不利影响。然而，总的来说 GDP 增长依旧是中国政策议程的核心，政府官员也将继续追求经济增长即使它是不利于环境保护的。

两极分化的社会

日益两极分化的中国社会使得政府解决环境危机的努力更加复杂化。建立环境与健康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鉴于个人每天接触到的环境危害的范围不同，建立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即使不考虑环境健康问题种类，健康影响在每个社区，甚至社区中的每个人之间并不是一样的。

如同所有的公共政策问题，政府对健康危机的积极应对很可能产生赢家和输家。主张保护环境的部门和非政府组织的权利和威望很可能上升，而污染环境的行业（包括为它们服务的人）则是输家。当《苍穹之下》，一部 TED 演讲形式的关注中国空气污染的纪录片在中国快速传播时，2015 年 3 月，新任的环保部部长亲自向制片人柴静表示感谢。不过，石化业内的一些人士对柴静的一些说法有争议，其认为宽松的石油质量标准是空气污染恶化的主要原因。

环保组织——官方的和非官方的——与既得利益阶级之间的紧张关系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日益两极分化。尽管柴静的纪录片很受欢迎，但仍有相当数量的中国网民质疑片中关于企业行为同污染之间关系和政府与市场所扮演角色的观点。许多官员和知识分子质疑柴静的动机和公正。尽管最初似乎是政府批准的纪录片，但《苍穹之

下》对既得利益集团抵制更严格的燃油标准和政府机构实施更严格的监管标准的失败的尖锐批评，很快使得最高领导人有了其他想法。在视频发布的一周内，视频被政府审查机构封杀。

环境保护财政

中国环境导致的健康危机的规模和范围都突出了在公共环境保护上的财政缺口。在 2006 年之前环境保护都不在中国的财政预算之中。据环保部副部长说，政府将会拿出 9650 亿元用于治理空气，水和土壤污染。但是在 2013 年政府支出中用于“节约能源和环境保护”的仅占大约有 430 亿元总财政支出的 1.9%。由于地方财政权利与责任的不匹配，以及未能将环境保护因素纳入财政转移支付系统中，地方政府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去进行有效的环境保护。

在中国的所有省份中，只有上海和广东明确提出了从 2011 年到 2015 年提高环境保护支出占 GDP 的比重至 3%。鉴于最近的经济下行这种情况不可能很快得到改善。2015 年 2 月，国家公共财政收入同比仅增加了 0.26%，而公共财政支出增长了 55% 以上。尤其是中国逐渐衰退的房地产市场影响了地方的财政预算。中国地方政府普遍依赖于土地收入，这几乎占据了总收入的四分之一。2 月，全国土地出让收入同比下降了 36%。

混乱的管理

最后，应对环境危机需要的远远不止一个部门或行业的改变。与传统的通常可被一个特定政府机构管理来解决的危机不同，环境危机并不是某一个特殊政府机构的责任，利益冲突和责任的纠纷很可能导致部门之间的紧张和互相指责。为应对如此复杂的危机，一个强有力的共识在国际发展社会中已经出现：达到环境，社会，健康和经济目标的最好方式是通过跨部门的协同效应。跨部门的协同或者“整个社会”方法需要的不仅仅是国内不同政府机构之间的协调（卫生和环境机构同负责土地开发和发展的部门），也包括非政府部门，企业和市民的社会组织。

不幸的是，中国的危机治理似乎完全由政府部门主导，缺乏永久和独立的机构来监管危机治理和协调工作，纵横交错的当局已经变得极为复杂和臃肿。拿水污染防治和治理来说，国务院行动计划列出了 76 个子目标，其中 72 个需要全国层面的跨部门协调，这涉及 2 个到 8 个政府部门，通常需要一个中心部门来充当领导机构。环保部被任命为几乎一半问题目标的领导机构。然而对于一个权力较小的机构如环保部，这样的制度安排很难达成有效的机构间协调，更不用说维持。此外，正如 CFR 的伊丽莎白经济所观察到的，背景

强调的大规模，自上而下的计划并没有考虑到有效的环境健康标准通常在最微观层面执行。

与许多其他国家不同，中国并没有强大的民间社会组织来弥补政府能力的不足。中国并没有接受社会团体诸如非官方组织和污染的受害者，来作为积极政策变化的合作伙伴和促进者，政府依旧认为他们是潜在的麻烦制造者，并阻碍社会团体参与政策制定的制度化。这并不是一个对国家和社会的协同方程，解决环境健康调整需要中国领导人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网络生活——智能手机，社交网络和多任务进行

Thomas Herdin & Robert M. Bichler

1. 简介

在全球范围内，社交媒体的应用在日常生活中已经成为媒介消费的一个核心支柱。尤其对于受到良好教育的年轻人来说，像社交网站（SNS）的科技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事实上占据了社交生活的方方面面。当这样的应用越来越多地通过移动设备访问，主要通过智能手机，这种现象便愈加普遍。无处不在的 SNS 根本性地重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亲密度，改变了沟通的方式和社会化的过程，特别是在年轻人之间。这种发展引起了一个关键问题：这些转变在东西方文化中是否不同，或者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它们是相似的。

在一项 2014 年和 2015 年进行的研究中，这篇文章的作者比较了中国大陆和奥地利、欧洲的大学生的动机、行为和偏好。问卷被发放到中国三所著名的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的媒体和通讯专业的学生，奥地利的萨尔茨堡大学的传播学专业的奥地利和德国学生。讨论的结果依据于 450 份完整的问卷（中国 236 份，奥地利 214 份）。此外，调查小组评估了 SNS 的情感品质。我们的研究主要被这样的研究问题引导：社交网站如何影响形成和处理社会关系的方式？

接下来我们主要关注两个中国网上行为的主要特点和其对认知效率的影响。

2. 多任务执行的现象

我们的一个重要发现是在中国学生中，多重任务的新现象在社会关系的处理和日常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通过一方面总是在线的必要性，另一方面立即回复的压力反映出来。

2.1 随时在线

同奥地利和德国学生相反，对于中国学生来说在任何情况下保持联系似乎是非常重要的。61% 的中国受访者表示当与朋友见面时依旧在用自己的智能手机，有 33% 的人在与家人一起聚会时依旧使用它。在这两种情况下奥地利和德国的学生的比例相当低。在较小程度上，这个发现也适用于学习和体育训练的大学课堂上（见表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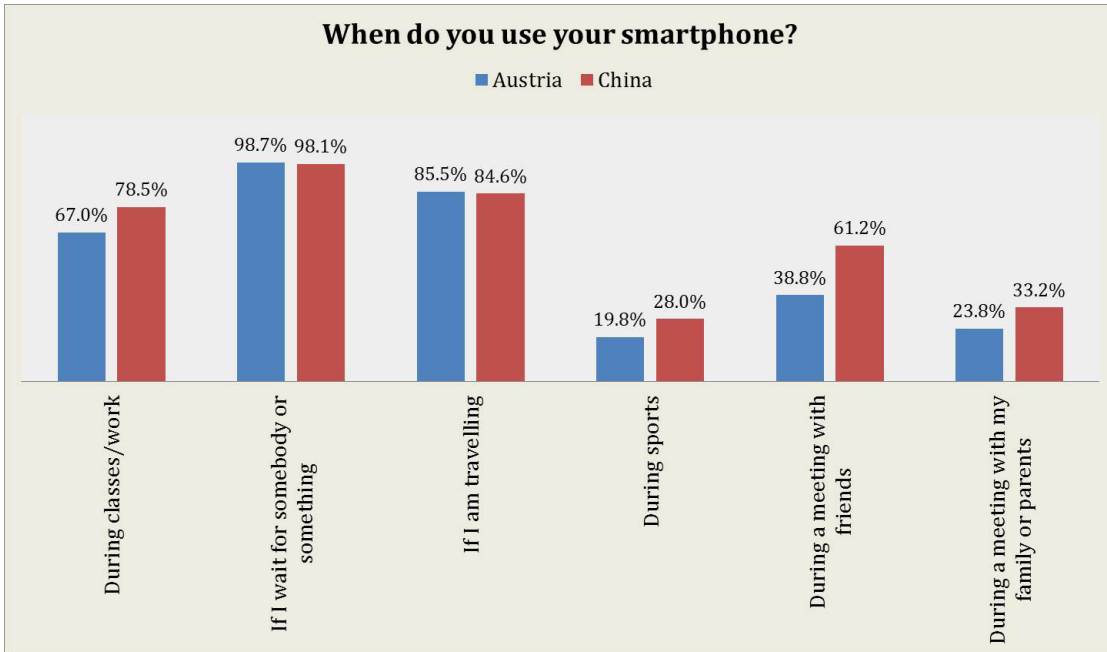


表 1：日常生活的智能手机使用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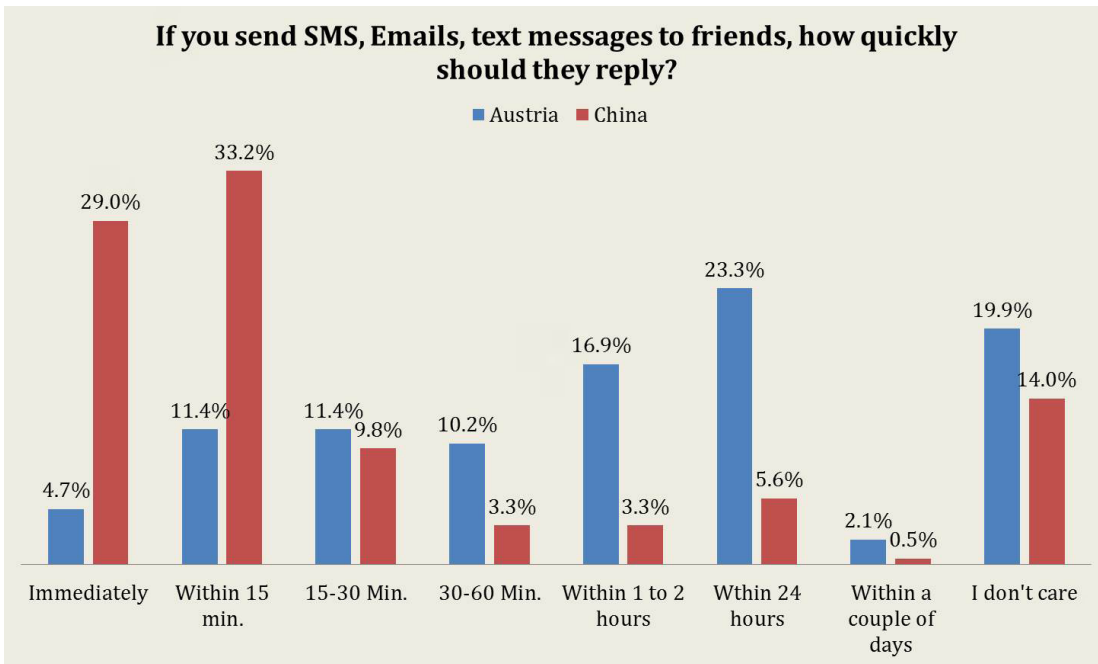


表 2：回复时间

2.2 即时回复

我们也询问学生：他们想要多快去回复一条消息（通过 SNS 等回复邮件，短信）。中国和奥地利、德国学生之间的差别更加明显：总计 62% 的中国学生表示他们期望能在 15 分钟内回复，然而仅有 16% 奥地利和德国学生想要这样的快速回复（见表 2）。

3. 讨论

一个通过运用施瓦茨价值尺度 (SVS) 对学生和管理者 (N=1732 人, 主要在上海) 1988, 1995, 2007 年和 2014 年的价值研究表明, 基本价值观依旧保持非常稳定。SVS 价值方法, 一个建立于跨文化心理学的经验性概念的文化价值观, 是指可被看作为包容性的基础理念的基本价值观, 这种基本价值观主要是关于在所有文化中人们所想要达到的理想目标。SVS 方法将 57 个多元价值观分类成十个价值类型: 权力, 成就, 享乐, 激励, 自我, 普世, 仁慈, 传统和安全。在上海相对于欧盟的国家来说诸如成就、权力和地位这样的价值观更加的重要。所以上海的人们有很强的功利取向特点, 取得成功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这种态度反映在新的信息与通讯技术的使用上。随时保持联系和及时回复被看作为一个成功的职业生涯中的关键因素, 而这使得多重任务成为当务之急。多重任务经常发生在一个人试图同时执行 2 项任务, 从一个任务切换到另一个任务, 或在任务序列上执行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任务。相信这样的工作方式能够提高工作效率, 然而科学家一直认为不可能同时处理超过一个字符串的信息。最近的一些研究表明多任务执行实际上为认知效率带来了很大的风险。因为人类的信息处理能力是不足以处理多个刺激和同时进行多个任务的。因此, 多任务从表面上看似乎是效率较高的, 但实际上最终会花费更多的时间并导致更多的错误。甚至有人认为由任务间切换导致的短期精神阻碍会导致人们高达 40% 的生产时间的浪费。

4. 结论

多任务执行当然也有自己的优势但是——正如前面所讨论的——持久的多任务执行给我们一个非常有效率的错觉。尤其对学生来说, 在学业与其他任务之间的切换更加适得其反, 因为这样会使得学生过度处理信息, 并导致无法进行更深层次的学习。“随时在线”很明显会扰乱学习过程。它并不仅仅导致了注意力的缺陷, 而且也产生了一种生理后果。同时处理了两件或更多的事情会带来更大的压力, 这会使得身体分泌影响记忆和认知功能的应激激素和糖皮质激素。

“随时在线”和“即时回复”也会对创造力产生负面影响。创造力需要一个有活力的工作流程和勇于去打破思维定式。当人们并不是一直忙于某个问题或任务时才会激发出一些深入的思考。因此对于孵化新观点来说休闲时间是一个宝贵的时期, 人们可以从日常生活中远离一步, 之后提高创造力。当今很容易看到一些“低头族”, 只要人们没有事情的时候, 他们的低头看向手机, 眼睛也总是锁定

在一个狭窄的视野中。我们经常不得不付出一些精神代价，因为为了保持创造力和效率，不要使自己一直处于忙碌状态是非常重要的。最好的结果是基于对紧张和放松之间的平衡，对意识集中和思想神游的平衡。在一段时间内我们使我们自己专心于自己的事务将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意识到使用移动设备的优势，劣势和风险，而且均衡地使用移动设备不仅会带来一个更好的生活，而且最后也会带来更高的效率。那么一个关键的问题，每个人都应该去问自己：什么程度才是合适的呢？

（作者 Thomas Herdin 曾作为复旦发展研究院访问学者，此文为其访学期间所写。）

译者 / 赵哲锋

《中国观》2015年长期征稿启事

为更好地落实新型智库建设，推动科学研究与决策咨询的相互转化，提供更多高质量、高水平的咨询报告与专家建议，复旦发展研究院和上海市高校智库研究和管理中心拟就《中国观》向国内外学者长期征稿。《中国观》以中国当下各领域的热点议题为关注重点，每月上月刊以“国际视角 前沿观点”为主题，选编国外顶尖智库最新中国研究成果，每月下月刊以“中国智库 建言发展”为主题，收录国内智库专家对当前中国热点问题的政策分析。

一、征稿要求

1、政策分析或建议，对前瞻性、综合性问题有深度思考，选题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中国内政、外交、经济、社会、教育等与中国发展密切相关的领域。

2、英文版：可推荐国外智库或主流媒体发表的英文稿件（如为其他种类语言，请附上200字左右文章概述），亦可投送本人英文研究成果，经编辑部确定用稿后，由荐稿单位或个人组织翻译，或由编辑部统一翻译。

3、中文版：（1）各单位或个人可向编辑部投送稿件，选题自拟，语言精练、平实，避免学术化，字数3000字左右，文末附100字以内的作者简介；（2）如稿件涉及重大敏感问题，请勿用电子邮件直接发送，将文稿刻录光盘同纸质文本一并寄送至编辑部。

二、投稿须知

1、投稿邮箱为：centrems@fudan.edu.cn，投稿时邮件主题处填写稿件标题，在文末附上以下内容（个人信息十分重要，要求准确无误）：文章标题、作者姓名、荐稿人姓名（或单位名称）、邮寄联系方式、电子邮件、电话号码。

2、一次一稿，请勿一次多稿或重复投稿。

3、允许稿件向其他刊物或渠道投送，录用意见一月内给出。一旦录用，编辑部会给予适当奖励。

三、联系方式

联系人：黄昊，夏梦

联系电话：021-5566 5501

电子邮件：centrems@fudan.edu.cn

寄送地址：上海市杨浦区邯郸路220号，复旦大学光华楼东辅楼703室

邮编：200433



复旦发展研究院

复旦发展研究院成立于1993年2月12日，对外立足于一流智库的建设，为国家和上海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复旦的思想与智慧，成为国家的思想库和智囊团；对内立足于学科的交叉与整合，研究团队的建设与发展，以国家需求推动学科整合，以学科整合贡献国家发展，提升复旦大学在国家建设与进步中的地位与影响。复旦发展研究院所孵化和培育的研究机构包括7个国内中心，即：金融研究中心、金砖国家研究中心、沪港发展联合研究所、传播与国家治理中心、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社会科学数据研究中心、中国保险与社会安全研究中心；3个海外中心，包括：复旦-UC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复旦-欧洲中国研究中心（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复旦-墨西哥中心（墨西哥蒙特雷技术大学）；1个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家俱乐部，2个大型论坛秘书处，分别为中国大学智库论坛秘书处与上海论坛组委会秘书处。



上海市高校智库研究和管理中心

上海市高校智库研究和管理中心在上海市教委领导下，依托复旦大学，致力于培育和提升上海高校智库建设的能力和水平，构建国内有地位、国际有影响的上海高校智库体系，以服务出管理、以内部交流出整合、以国际对话出影响、以评估出质量、以贡献出地位，搭建立足上海、服务全国和放眼世界的交流平台、推介平台和国际对话平台。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聚合上海高校的学术和智库资源，转化智库研究成果，为国家和政府建言献策；通过媒体向大众推介智库思想，实现学术成果的社会价值；培育有咨政能力的复合型优秀学者，推动高校学科建设，促进新型特色高校智库发展。

中国的角度

世界的维度

专业的深度

战略的高度

一般性声明：

* 本刊仅供本刊编辑部呈送的特定对象阅读使用，不做任何商业用途。

* 除明确提示的文章外，本刊其他文章基于已公开信息编译或选摘，但本刊不保证该等信息的准确性或完整性。

* 本刊所编译、选摘的文章，仅如实、客观反映原作者观点和立场，并不代表本刊编辑部的观点和立场。

* 本刊属于内部资料，本刊编辑部对其保留一切权利。除非本刊编辑部事先书面授权，本刊的任何部分均不得以任何方式制作成任何形式的拷贝、复印件或复制品，或分发给特定阅读对象以外的人。

General Statement:

* This publication is provided by the editorial team for use by specially designated persons only. It is not for sale or redistribution.

* Unless otherwise noted, this publication's content is compiled, translated and edited from publicly available information. It does not guarantee the accuracy or completeness of said materials.

* Views expressed in the articles here are the original authors' own and do not represent the views of the editorial team.

* Material on these pages is for internal reference only. The editorial team reserves all rights. No portion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copied, altered in any way or transmitted to others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editorial team.